

历

史

学

家

随

笔

丛

书

谔 谔 集

丁守和随笔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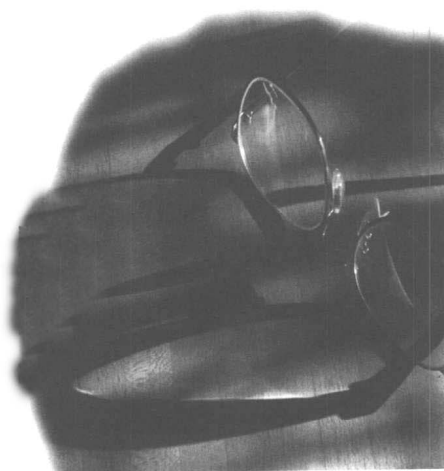
戴逸◎主编

谔谔集

丁守和随笔

历史学家随笔丛书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(桂)新登字 01 号

策 划 彭 匈 曹光哲

责任编辑 韦向克

责任校对 陈红燕 李 钊

历史学家随笔丛书

谭 谭 集

丁守和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邮政编码: 530021)

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)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9.25 印张 200 千字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1999 年 5 月 第 1 版

199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ISBN 7-219-03967-0 /K·803

定价: 15.00 元

自序

时间过得真快,来到北京已经整 50 年了,从事研究工作也有 40 多年。来时还是个 20 多岁的青年小伙子,与几位同志背着行李包走来的,而现在已经是在年过古稀的老翁了。

我 1950 年调中央编译局工作。1959 年“反右倾”时挨了整,下放安徽省农村劳动一年。回来后去看姜椿芳副局长。他告诉我,编译局不再研究中国问题,研究室的人多已调中央党校,李践为(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,后任副校长)也希望你去。还说黎澍已调近代史研究所,任副所长兼《历史研究》主编,他也希望你去那里。我问他看去哪里合适,他说你这个人

爱讲话，好提意见，还为别人抱不平，你看这次整得多厉害，恐怕还是搞些学术研究好。

1961年我到近代史所，黎澍要我负责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工作。当时人少事多，是够忙的。我在编译局时曾主持编写五四时期期刊介绍，并在这基础上写了《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传播》的初稿，人民出版社也看过，因为挨整就放下了。这时我抽时间作了修改补充，就交稿了。1963年出版，反映不错。孰知一年后，康生却说我利用历史研究反党，为大叛徒陈独秀翻案，是大本毒草，被禁书毁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到无数次批斗，甚至挨打。其实这本书决不是什么反党的问题，而是也受到当时“左”倾思想影响。在那年月，又能说什么呢？

我由研究五四开始，进而上下扩展，研究近代史，也涉猎古代史，主要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。我负责编《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》及《中国历代奏议大典》时，阅读过诸多奏议文章，很喜欢那些秉笔直书，有意见实话直说的“谔谔”之声，不喜欢那种唯唯诺诺，吞吞吐吐，拐弯抹角之言。

几十年来，我在学术研究中写过几本专著，有 200

多篇长短不一的论文。虽然我很喜欢陈独秀、鲁迅及《新青年》、《晨报副刊》、《申报自由谈》等报刊上的杂文、杂感、随笔,但从未写过这样的文章。就是读古文时,也背读过一些名篇,记过一些名句警句,那主要是为写文章时思考或引用,而未写过散文。

这次承担写一本史家随笔,实在说是不够格的。不过既已答应下来,也只有勉强为之。其中有少数是旧作,做了些修改,大多是新写的。有读史品味,谈文随想,也有对媒体报道的思考,还有些往事的回忆等。虽然缺乏文采,不过尚能就所读所思所想或所见直笔写来,也许能提供些史料及事实原委,或值得思考的问题,或能咀嚼些味道吧!

目录排出后,用个什么书名,一直未能确定。所里一位年轻的学者雷颐,常写些杂文之类的短篇。他看过我的某些文章,建议用《谔谔集》名,还说你能秉笔直书,开会发言或讲话往往声音洪亮,有话直说,而又头头是道,颇有些讲究,用这个书名也符合你的个性。有几位朋友觉得也可以。于是用了这个书名。

1999年春节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------	---

读 史

水不能壅,口不可塞	3
千夫诺诺,不如一士谔谔	9
谤木·善旌·华表	17
墨墨乐师论“五墨墨”	25
颜福与齐王议君士孰贵	30
侏儒宦官议隋炀帝必败	35
天命·人事·德政	39
作民主与民作主	45
由民作主与为民作主	54
人格·人权·理性	64
国耻·学习·奋进	70
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	75
还是应该坚持历史主义	81

谈 文

文化研究应立足于现实	
——《红旗》记者专访	87

追根溯源谈道统

——首都经济信息报记者访谈	95
以科学态度研究传统文化	100
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	109
优越意识与忧患意识	117
传统道德的分析化解与继承	126
谈近代文化史研究	134
自强·奋进·求索	140
思维·致用·求真知	145
文化继承、吸收和创新问题的思考	151
北京与北京文化	154
抗战中的文化教育精神	
——人民日报记者访谈	160
在文化交流中求共识	165

思 考

还是需要“民主”的新路

——兼议“优越心态”	171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独立思考,百家争鸣

——致《中国文化研究》主编的信	175
产品质量与人的素质	178
为人民服务还应该再加两句话	184
我们就是要为人民当家做主	190
又要调节人口了	195
由秦皇汉武到蒙城交税事件引起的思考	199
打老虎与打苍蝇	203

回 忆

反对放空炮	211
反对把农民战争史现代化	216

坚持历史主义	220
坚持科学性	224
沈元文章的风波	229
李秀成自述的争论	233
康生说我利用历史研究反党	237
人道主义和“清污”	245
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——忆邓广铭先生	250

序 跋

《中国历代文化概述》序论	257
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道路与选择》前言	262
《现代中国文化走向的探讨》序	267
《西方思想家宝库》主编的话	271
《广州国民政府》序	274
《百年通俗演义》序	278
《瞿秋白文集·政治理论编》编后记	282

读史

水不能壅，口不可塞

江河湖水只能疏导，而不能壅堵。人虑之于心脑，而宣之于口，也不能堵塞，不让其讲话。这也就是说，为君主帝王者、统治者应该广开言路，让众臣僚官吏直言上奏，议论国事，也要让庶民百姓讲话，街谈巷议，发表意见，批评指责，以使朝政清明，国泰民安。

在先秦的诸多论说和文献中，或直言上奏，或婉言劝导，从多方面谈到这个问题。如商代伊尹就曾告诉太甲：“先王肇修人纪，从谏弗拂（如流），先民时若。居上克明，为下克忠，与人不求备，检身若不及。”劝其多听谏言，敬德修身，严于律己，宽于待人。他还告诉太甲切戒“三风”（巫风、淫风、乱风）与“十愆”（即恒舞于宫、酣歌于室、专寻求货、色、游、畋、侮圣贤、逆忠言、远耆德、比顽童）。（《尚书·伊训》）

他认为,为君之道要听言纳谏,勤思虑,善明断,戒除“三风十愆”,才能治理好国家。武丁即位后阴祀(守孝)三年,仍不理政事。君臣咸谏于王曰:“知之曰明哲,明哲实作则。”希望他能了解民情,善理政事,并“作书以告”,“以台正于四方”,做一个明主。于是武丁选贤任能,立傅说为相,并告诉他“朝夕纳海,以辅台德。若济巨川,用汝作舟楫,若岁遇大旱,用汝作霖雨”。“启汝心,沃朕心”,“以匡乃辟”,“以康兆民”。就是要傅说经常进谏教诲,多用心思,出主意,想办法,以辅佐君主,纠正违失,以利民生。傅说奏曰:“惟木从绳则正,后从谏则圣。”(《尚书·说命上》)认为只要能虚心纳谏,多听取意见,就会成为明君,臣自然也会纳海进谏,庶民也会讲话。武丁深表赞同,故殷道复兴。

周公旦辅佐成王,循循善诱,多方开导,劝其以殷纣王“迷乱酗酒”、“暴虐无道”、“杀忠良”、“惟耽乐”为戒;而以文王“克自抑畏”、“卑服”、“即康公田公”(即重视安民、奖励农耕)、“怀保小民,惠及鰥寡”为训,强调“君子其所无逸,先知稼穡之艰难”。必须知道耕田种庄稼的艰辛,切戒好逸享乐、迷恋酒色、游畋无度。还告诉成王,立政之本在安民抚众,选贤任能,“勿与俭人,其惟吉士,用劬相(努力治理)我国家”;并且要与众臣“相训告,相安顺,相教诲”,“躬行九德”,“恤民慎刑”。即使庶民“怨汝”、“詈(骂也)汝”,亦“不敢含怒”,而应该“厥衍(认识过失)敬德,更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欺骗,“乱罚无罪,杀无辜”。(《尚书·无逸》、《为政》)道理讲得深透实际。召公奭(或称邵公,即召康公之后,穆公虎也)亦进言说:“我不可不监(鉴)于有夏,亦不可不监于有殷。”夏殷均称“服天命”,但“惟其不敬厥德,乃早坠厥命”,必须记取这个教

训。当时成王初即位，准备在洛阳修建宫室，派召公前去相宅。于是召公作《召诰》，劝成王“其疾敬德”、“上下勤恤”、“王厥有成命，治民今休”。就是要“治民”，务须“敬德恤民”，方能获得“太平之美”。

有些奏议或谏文则比喻联想，语言精湛，思想深邃有力。如周厉王暴虐无道，搜括无度，闹得怨声载道，“国人谤之”。召公告之曰：“民不堪命矣！”厉王大怒，便使卫国巫祝侦察暗访以告，皆杀之。“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”闹得人心惶惶，谁也不敢再讲话，在路上相遇，也只是以目相视而已。周厉王洋洋得意，并告诉召公说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召公答说，这哪里是“弭谤”，而是“障之也”！是杀人塞口，不让人讲话罢了。他说：“防人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是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，岂可塞乎？”很清楚，防止江河之水泛滥只能疏导，用壅塞的办法就会使堤决而溃，造成重大灾难。对民也是这样，只能宣之使其言，择善而从，若堵塞言路，只能使怨愤加深，造成江山社稷动乱，那是很危险的。

于是召公引经据典，议论滔滔一番。“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（讽告之），瞽献曲（乐曲规劝），史献书（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），师箴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、史教诲，耆艾修之，而后王斟酌焉，是以行事而不悖。”只有通过各种途径，了解各种情况和问题，听取各种直言谏议、箴言谤议、讽颂刺语，及往圣先贤的教诲，等等，并且斟酌取舍，仔细考虑而行，才能治理好国家。故召公又说：“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；尤其有高低平原肥沃之地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

乎兴,行善而备败(民所善者行之,民所恶者改之),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。夫民虑之于心,而宣之于口,成而行之,胡可壅也。若壅其口,其与能几何?”(《国语·周语上》)厉王不听。杀人弭谤,防人之口,堵塞言路,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三年之后,厉王被放逐于彘(晋地),不是偶然的。

《吕氏春秋》进而谈到朝政的壅塞郁结问题,且联系尤多,给人启示。其中指出,君主高高在上,称孤道寡,很容易上下不通,发生壅塞,而壅塞就会造成郁结。人的精气郁结,血脉不通畅,就会生病;水郁结就会污秽,树郁结就会长蠹虫,草郁结就会腐烂。“国亦有郁结,主德不通,民欲不达,此国之郁也。国郁之久,则百恶并起,而万灾丛至矣。”(《达郁》)如何解决国之壅塞郁结呢?《吕氏春秋》认为,关键在于广开言路,让人们讲话,多听忠言直谏箴谏,乃至流言飞语、非议谤议。它说:“欲知平直,则必准绳;欲知方圆,则必规矩。人主欲自知,则必直士。故天子立辅弼,设师保,所以举过也。夫人故不能自知,人主尤其。存亡安危勿求于外,务在自知。故尧有欲谏之鼓,舜有诽谤之木,汤有司过之士,武王有戒慎之黻,犹恐不能自知。今贤非尧舜汤武也,而有掩蔽之道,奚由自知哉?”(《自知》)自知不明,掩蔽有术,就很危险。又说:“亡国之主必自骄,必自智,必轻物。自骄则简士,自智则专独,轻物则无备。无备召祸,专独位危,简士壅塞。欲无壅塞必礼士,欲位无危必得众,欲无召祸必完备。”(《骄恣》)所以,“圣王之贵豪士与忠臣也,为其敢直言而决壅塞也”。并且发挥召公的意见,说:“治川者决之使导,治民者宣之使言。是故天子听政,公卿列士正谏,好学博闻献诗,蒙箴师颂,……而后王斟酌焉。是以下无遗善,上无过举。”(《达

郁》)这一番通塞、达郁的议论,头头是道,含义深邃。不但顺理,而且颇有哲理,对于治国安邦、安民治民很有意义。

《吕氏春秋》还有《贵直》、《察贤》、《直谏》等篇,也是强调君主招贤纳谏,鼓励臣下敢于直言上谏的重要,并结合实例论说。如云:“贤主所贵莫如士。所以贵士,为其直言也,言直则枉者见矣(木不直、人徇私均为枉)。人主之患,欲闻枉而恶直言,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,水何能自至?是贱其欲而贵其所恶也,所欲怎么能自来?”(《贵直》)是故贤主必须贵直言敢谏,而远阿谀逢迎。如齐桓公与管仲、鲍叔、宁戚一起饮酒,桓公对鲍叔说,何不举杯祝兴?鲍叔起而进言曰:“使公毋忘曾出逃于莒也,使管仲毋忘被缚于鲁也,使宁戚毋忘其贩牛而居于车下。”就是说不要忘记过去的困境和患难,不要骄傲自满,而要居安思危,深思熟虑,把眼光放远。于是桓公离席位再拜说:“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,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。”(《直谏》)当时齐桓公“可与言极言”,故其称霸不是偶然的。又如晋国的赵简子(名鞅)有赵厥、尹铎二大夫。简子说:“厥很爱我,铎则不爱我。厥之谏我,必于无人之处;铎之谏我,总是质问我于众人之中,使我出丑。”尹铎对说:“厥爱(惜)君之丑也,而不爱(明也)君之过也。铎则爱明君之过也,而不爱君之丑也。……不质君之过于人中,恐君之不能改也。”简子信服。由此也可见赵简子之贤。“人主贤,则人臣之言刻。”(《达郁》)简子如不贤,尹铎也不会居赵地,更不可能在其左右。在大庭广众之中批评指责君主,使其出丑,不必说古代君主难于忍受,就是现代的领导者也不容易做到,而两千多年前赵简子却加以提倡,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淮南子》也是好引经据典，议论滔滔。如其中《主术训》云：“尧置敢谏之鼓，舜立诽谤之木，汤有直谏之人，武王立戒慎之鼓，过若毫厘，而既已备之也。夫圣人之于善也，无小而不举；其于过也，无微而不改。”尧舜禹汤文武就是这样做的，故能使诸侯信服，“坦然天下而南面焉”。该文还进而指出，为君之道，必须理民情，广视野，善听闻。“心知规而师傅谕导，口能言而行人称辞，足能行而相（仪也）者先导，耳能听而执正进谏（或进谋）。是故虑无失策，谋无过失。”如果“塞其耳而欲闻五音，掩其目而欲瞽（察也）青黄，不可得也。”所以必须多听箴言谏议，多察下情民情，了解民间疾苦，广听闻、多思虑、慎政令、省刑罚、薄税敛，才能治理好国家，安定社会。当然在君主专制制度下，这些往往流于形式，成为空言，总难逃出“其兴也淳焉”，“其亡也忽焉”的周期律。但是在那时能提出这些主张和意见，特别是提出“川不能壅，口不能塞”，必须让人民讲话，让人民街谈巷议非议，甚至谤议，讲些真实话，还是很有意义的。